

试论《韩非子》散文的“幽愤孤峭”

王曰美

《韩非子》一书中除去公认作伪的篇目，从形式上看可谓诸体多有，从内容看也可谓材料丰富。我们要论述的是韩非子的抒发身世不遇之感的结构完整的说理散文，包括《孤愤》、《说难》、《难言》及前贤论定的诸篇上韩王书，至于《五蠹》、《显学》亦乃“愤世之辞”，我们也归入此类。韩非此类文章的风格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幽愤孤峭。幽愤是从文章情感讲的，孤峭则是从文章气势上着眼。

最能表现韩文幽愤风格的是《孤愤》、《说难》。《孤愤》一文首先指出，由于“智术能法之士”“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他们将“烛重人之阴情”，“矫重人之奸行”，所以他们与“当涂之人”一定是“不可两存之仇”。接着，韩非又指出，“当涂之人擅事要”，因而“外内为之用”，蒙蔽了君主；再加上他们善于迎合君主，“即主心，同乎好恶”，所以，他们受到君主的信任和重用。而法术之士，不但没有“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且“处势卑贱，无党孤特”，还要“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斗争的胜负是不言而喻的。文章写得最酣畅淋漓的是法术之士的遭遇：

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孤愤》，第207页。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页码）

行文至此，真是一句三致意焉。这里蕴含着作者多少孤独与悲愤的切身体验和难以言表的苦衷啊！读《孤愤》总感到有一股怨恨之气萦绕于字里行间，令人凄楚沉郁而愤懑万分。犹如“卞生既以抱玉而长号，韩公由之寝谋而内愤”（《孤愤》旧注，第209页）。因韩非在论说辩驳的同时，挥洒自如地融进了自己满腔怨怒和恨懣，才

写出如此令人动情的辞章。

韩非在《孤愤》中说：法术之士说君主是“蒙死而进其说”。读《说难》同样会受到阵阵怨愤的袭击，会使我们深深地沉浸在世情的险恶与人生的悲凉之中而不能平静：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说难》，第221页）

《说难》一文明白敷畅地分析了法术之士的险恶处境后，以喉下逆鳞之喻作结：“（龙）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说难》，第224页）韩非笔触所及，由“于吏诛”、“死于私剑”到逆鳞之喻都是循环往复地表达凄楚沉郁的幽愤之情，说理和抒情得到完美结合。

明代著名散文家茅坤论韩非子散文情感之幽愤：“……唏嘘者，愤懣者，号呼而泣诉者，皆自其心所欲为而笔之于书。”（茅坤《韩非子迂评后语》，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5页）笔者认为韩非子说理散文有愤懣，有号呼，而无泣诉，有的是居高临下峭拔的议论与辩驳。

《韩非子》严峻峭拔的风格，是古今学者的共同论断。据笔者所见，在明代不少文人认为《韩非子》的文章峭奇，最早的当推嘉靖万历年间的王世贞。他在《合刻管子韩非子序》中写道，韩非子“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王世贞《州续稿》卷四四）。这种风格在其抒发身世不遇

之感的篇目中又总是表现为居高临下的态势。文章感情激越,“所结撰之大旨,远者出人意料,而近者能发人之所欲发于所不能发”(同上)。故其气势是凌厉的。茅坤论道:“一开帙,而爽然、砉然、灏然、英精晃荡,声中黄宫,耳有闻,目有见。”(茅坤《韩非子迁评后语》,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附录,第1235页)故韩非子有关身世不遇之感的说理散文中的不少篇目都先声夺人,犹如大雨前的惊雷般震撼人心。

《难言》是韩非上韩王书,第一段一连用了十二个排比句: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绵绵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判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闲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难言》,第48—49页)

以上引文结合《孤愤》等篇,可知韩非多次通过口头和书面向韩王进谏都失败了。韩非在进言失败后左思右想,为什么韩王如此颀颀?情急之中,再次上书表明自己的苦衷和赤诚之心。正因为情急,所以上书的一开头就用了十二个排比句,加强了语势。用排比句将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接连排列,读起来出现相同节奏的重复,语气逐渐增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所谓下笔不能自休,有一种逼人的力量。南宋陈 在《文则》中说:“文有数句用一类字,所以壮文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明代论者亦指出韩非子《孤愤》篇“文气甚奇峭,其辞锋却以肆笔得之,议论则深刻痛快”(门无子、凌濛初《韩非子集评》卷四,《孤愤》篇后,明吴兴凌氏刊本)。《孤愤》开篇就将法术之士与“重人”(当权重臣)的尖锐矛盾揭示出来,咄咄逼人: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

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第206页)

韩非将法术之士和当权重臣的矛盾视为“不可两存之仇”。在篇首就揭示矛盾的不可调和,给人以突兀、峥嵘之感,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震撼。韩非用对比手法,加强了逻辑性和感染力,情感激切,风格沉郁。此段文字中,韩非用了很多分量重、力度强的词语,如“明察”、“强毅”、“劲直”等,这样既加强了对比,又气势陡起,一下子就造成严峻劲拔的氛围,令人肃然。

《说难》全篇营造气势,除最后列举两个历史事件为例外,排比句几乎贯彻始终。第二段先指出事情要保守机密才能成功,说者无意中泄漏了对方所要保守的秘密,说者本身就有危险,即“如此者身危”。韩非滔滔不绝地一连用了七个排比句,感情充沛,气势逼人。笔锋一转,韩非又用八个排比句阐明游说君主之难:

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说难》,第221—222页)

似这样的大段排比句,如决大川,发源于千仞高山,直泻而下,中游则壮阔奔腾又不泛滥旁溢,令人为之回肠荡气。韩非以前各家文章很少运用排比句,《孟子》、《庄子》、《荀子》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以单笔为主。

《韩非子》中最为人称道的富有气势的名篇是《五蠹》、《显学》,明朝人在评点中多有论列。如对《五蠹》总评曰:“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门无子、凌濛初《韩非子集评》卷一九,《五蠹》篇后)《显学》总评曰:“如黄河奔流,势不可御,而分支分派总归一途。”(归有光、文震孟《韩非子汇函》,《显学》篇后,明天启五年刊《诸子汇函》本)郭沫若先生对《五蠹》、《显学》亦深为推许,认为“都是波澜壮阔的文章”(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32页)。关于这两篇文章的气势也就无需我们游词费句了。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韩非子的抒发身世不遇之感的文章蕴涵着孤愤强毅之气,其孤愤坚毅之情思酣畅,感情强烈,处于高亢兴奋的心理之中,故而文章气盛。此外,韩非在阐明哲理时,对所欲说明的道理充满信心,是非了然,有高屋建瓴、利刃破竹之势。这充分体现在

韩非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揭露中。

韩非在论述人性自利时，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无情地揭示了社会关系中的非道德层面。韩非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人性”这一概念，而其文中却到处充塞着有关人性的论述。韩非关于人性的理论继承了慎到“因人之情”“人莫自为”的思想传统，主张人皆自为自利（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8页）。按常理，父母与子女间最亲近，不可以言利，然而在韩非看来血肉之情，也是计利而行的。他写道：“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第949页）韩非认为父母与儿子也有利益上的矛盾，所以父母虽爱子心切，但也管教不好儿子：“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五蠹》，第1051页）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计较利益之心更盛，“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难四》，第874页）。韩非认为父子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再无其他可言。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他说：“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备内》，第290页）人都是为名为利的，韩非借管仲的口说得更明白：“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君臣的关系完全是由势位尊卑所迫，是利害关系的关系，他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第800页）他甚至说君臣关系犹如人之养鹿，鹿完全为吃上君主给它的草料则驯顺。这样君臣之间都是唯利是图，因而他们的关系便成为互相计算的关系。他说：“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饰邪》，第311页）韩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君臣之间是买卖关系，各自为自身利益而互相计算，

这就把君臣关系中的道德价值完全否定了。

可见在分析人性时，韩非的思想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思想如此，文章亦如此。明朝人于此论述颇多。陈深曰：“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陈深《韩子迁序》，见门无子、凌濛初《韩非子集评》）非文章气盛，绝不至此。

文章的势离不开情感、义理、文辞。韩非子在其抒发身世不遇之感的说理散文中，幽愤孤峭的情感始终流贯其中，又辞气顺畅，读起来有欲罢不能的逼人力量，其思维的周详细密、犀利敏锐，可谓空前绝后。如韩非论人性，将温情脉脉的母子之情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之中，读韩非此类论断，可知其情感已发展到冷酷无情的地步，不禁为之怫然动容、毛骨悚然。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06页）古代文论家说：“文章家尝论喜快之言毗于阳，哀怨之言毗于阴。”（王道《重刻韩非子序》，见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附录，第1238页）韩文中情感的愤慨，论人性的洞烛幽微之峻刻，都属于文章中毗于阴者。

总之，学者多将韩文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其写作风格，但韩非子一书的文章“诸体多有”，“以后的研究如不从新的角度入手，恐怕很难再做出超越前人的成绩了”（费振刚《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本文就从一个新的角度——选取韩文抒发身世不遇之感的说理散文来论述其幽愤孤峭的写作特色。这种特色形诸文字，感情比较外露，犹如怒涛呜咽，无论抒发情感，还是辨析理论都有高屋建瓴之气势，这恰恰又体现出了韩文的阴峭之美。读韩文犹如仰视危崖万丈，危则危矣，但美的感觉却油然而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